

民初民主共和观念史论*

刘志强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辛亥革命后,两次复辟,民主共和观念并未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以致民主、共和等的制度建设难以建树。现代性的生成,如果不靠制度建设,仅仅靠强人治,必然是“种瓜得豆”结果。

关键词:复辟;传统文化;民主;共和

中图分类号:K25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49 (2012) 03-0078-06

为了瞻前,我们不得不顾后。武昌义举,辛亥革命以结束帝制,肇建民国而载入史册。然而我们过多的认同辛亥革命在国体上转轨的硬件,而或多或少忽略了支撑国体的民主共和等观念软件的关注。学界论著一般认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①辛亥革命的确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是否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本文拟从民初两次复辟帝制说起,对民初社会的民主共和观念作一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一、复辟皇权暗潮涌动

民国初年的政坛诡谲变幻,暗潮涌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的“丁巳复辟”,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酝酿和发展起来的,两次复辟闹剧的复燃并不是偶然的,其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彰显民主共和并未深入人心。

袁世凯消灭“二次革命”后,由临时大总统

而正式大总统而终身大总统,并进而企图登基称帝;而被推翻的清王朝并不甘心被推翻的命运,伺机复辟帝制。于是,在袁世凯和溥仪的周围聚集了两种形相各异而实质相同的复辟实体:一个企图复清朝之辟,拥戴溥仪复辟;一个力谋复帝制之辟,推动袁世凯称帝。两种复辟势力所拥戴的对象不一,但他们根植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结集于袁世凯周围的一股帝制的力量,他们为袁世凯的实力与权势所吸引,他们又煽动了袁世凯的帝王之想,拥着他从专制跨向君权,徐世昌说,方南北和议之际,“杨士琦主君主,人皆以为维持清室,不知杨之所谓君主者非溥仪,乃项城也。同时,汪兆铭、杨度组织国事匡济会,杨度亦主君主,其意图正与杨士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1] (P298) 这是一个源头。于是而有“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和“选举”中华帝国皇帝。两种复辟势力导致了“洪宪帝制”和“丁巳复

*本文为刘志强主持 201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权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变迁(项目批准号:12BFX014)阶段性成果之一;刘志强主持 2009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09YJA820015)阶段性成果之一;刘志强主持 2009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为:09JDXM82008)阶段性成果之一;刘志强主持 2010 年广州市教育局面上重点课题(编号:09A049)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2-06-03

作者简介:刘志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①这方面的说法在学术界占主流。参见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改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5 页。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6 页;杨鹏程:《“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未完成的文化使命》,《历史教学》2001 年第 10 期。

辟”两场历史闹剧。虽然这两场复辟皇权丑剧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令人值得玩味和深思。

在袁世凯和张勋的背后，有着新朝的元勋和旧朝的孤臣，他们后面又有着辛亥革命所没有革去的皇权心态。复辟的闹剧既反映了袁世凯和张勋的野心，又显示了皇权心态的迷醉。于是有所谓“自筹安会发起变更国体之议，二十二行省计四百兆生民响应云集，投票公决，咸恭戴我皇上万世一表，并奉以完全主权，万众一心，山呼雷动。由是而军政两界，而国民代表，而绅学农工商各社会，相继以请愿书上矣。群情爱戴之诚，望若云霓，归如流水，与沛然默莫御之势。”^[2] (P130) 这些来自各省吁请袁世凯登极的请愿书，固然不能用来说明当时的实情，但作为一种社会心态，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一部分的现实。张勋复辟的出现如同洪宪帝制一样，更具有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一夜之间称臣山呼万岁，粉墨登场，不亦乐乎！王朝已成为历史，与王朝相应的皇权心态却未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在推翻了帝制、建立共和后，还有那么多人热中复辟皇权的原因？就此而言，民主共和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反而使复辟皇权闹剧得以在民主共和的外衣下出现。

二、假共和真专制

民国新立，并未给中国带来统一、强大国家，相反，却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割据状态，从地方到中央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国体虽号称统一，而地方各自为政，统治权殆呈分裂之象，改制虽号称革新，而固有之行政系统破坏殆尽，新建者无代兴之实力，官僚称弊甚于晚清”，^[3] (P254-255) “盖自中华建国五千年以来，危急存亡千钧一发，未有甚于今时者也。”^[3] (P459) 混乱动荡的局面，使中央权力失控，统治功能失调，造成全面社会危机。民初，外患四通，财政艰困，秩序动荡，“大祸将至，瓜分之不免耳”的呼声充斥报界。忧虑和不安之余，国人首先表现出对共和政治的怀疑，认为民初共和政体的创建是“人民基于感情，不及三思的结果。”^[4] (P591) “全国人心厌倦舆论，厌倦政党，厌倦国会，厌倦国家。”^[5] (P100) 对于共和政治的不满心情

溢于言表。其次，国人急切表现出盼望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心理，强烈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迅速统一全国，安定社会，以免出现“将以内乱外患而四分五裂”之状。1913年3月，湖北商民裘平治上书袁世凯，“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隶，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6] (P547) 社会呼吁集权于中央，以求稳定，自然把整顿秩序、谋求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寄希望于当时声望实力俱有的袁世凯，希望他“在此存亡危急之倾，国土保全为重……宜请大总统暂以便直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7] (P378) 《临时约法》本是革命派用来束缚袁氏而设置，以保证他能够履行共和政治，在民初混乱政局之下，在人们心目中，它失去了它应有的功效，厌乱求治的心理使人们对共和政治失望，对袁世凯寄以厚望，以致于袁氏敢摆脱《临时约法》的束缚，随意改变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地点，从而为袁氏走向独裁复辟埋下了社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民初资产阶级各派也都表现出了希冀社会稳定、统一的心理。民国初年，从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来看，占统治地位的仍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到1920年，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还只7.84%。^[8] (P1051)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初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仍处于绝对劣势，这说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未能拥有能决定一政府命运的经济力量。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弱势地位，在民初首先表现出支持袁世凯以求得社会稳定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倾向。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商人不但站在袁世凯一边反对“二次革命”，而且支持他同国会作斗争，直到彻底摧毁共和制度。“二次革命”时不少商会宣布“中立”，但实际上，他们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的立场是十分明显的。当时全国商界有则通电：“中央为统一国家，整饬纲纪，不能不大张挞伐，诛绝叛徒。”赣宁地区商会要求讨袁军“让城别走”，以谋安宁。^[9] (P38) “商人风鹤时惊而重围……惴惴焉怀生命财产之忧。”^[10] 这是当时商人的共同心态。赣宁之役烽烟方息，商人又大

力支持袁世凯爬上大总统宝座，并发表通电：“今后与其频更总统而多劫，勿宁任总统而暂谋安”，“如能定总统十年以上较长期间（则）幸甚”^[11]，充分表露了他们依赖袁氏安邦治国的心理。帝制过程中，避乱求安的心理在商人头脑中仍占主导地位。“二十一条”时，他们对袁氏以忍耐为主，北京茶馆、酒肆以“莫谈国事”自律。在袁世凯的利诱拉拢下，各地商人还一度列名于劝进表，通电拥戴。北京商会总理冯麟发起庆祝会，领衔劝进表，甚至在袁死后，还倡议全国商界开追悼会。注重近利而不计长远，害怕动乱而追求安宁，在商人看来，只要社会安定，他们才不在乎袁氏终身长任总统，即便是当个实际上的“皇帝”也罢。

革命派虽然在民初国会中为维护共和与袁世凯作了激烈的斗争，但这时的革命性已大不如前，革命党人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稳定社会、力谋建设的倾向。革命领袖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认为“政治上革命，今已如愿而偿矣，后当竭力从事于社会上革命。”^{[12] (P411)}推荐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为总统”^{[12] (P440)}。孙中山尚且如此，还需言他。此时，孙中山到处演讲铁路建设，认为在袁世凯统治下，铁路可建20万公理，练兵可达数百万，国家自然就富强了。革命前以攻战文字犀利而著称的章太炎则提出“专制非无良机，共和非无秕政”，为稳定社会，“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13] (P537)}并幻想袁氏“厉精法治”，“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13] (P584)}。虽然同盟会中有激进派不断提出对袁氏进行革命斗争，但其势力极弱而为温和派论调所掩盖。革命派对袁氏的认识不清和盲目乐观，导致他们犯了判断失误，尽管他们较早地站出来反对袁氏专制、独裁，但其寄望强人政治的心理，负面效应却是严重的。

与袁世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康梁立宪派，在民初提出了“国土要统一，政权要集中”的主张。基于开明专制的理论，梁启超在民初大力宣传保国重于共和的思想，认为中国“绝不可效鞞美国剖之为若干独立小邦，使各自为政”，这样“势必将粉絮破碎，迫于部落而已”^{[14] (P43)}，最

终导致民国分裂，为了保持和平与稳定的秩序，他对袁世凯寄了莫大的希望，声言袁氏“确在中国有一种大势力，确为中国现时一大人物”^{[15] (P9)}。梁启超这种主张，无疑迎合了袁世凯的心理，间接鼓舞了他走向专制复辟势头，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可以说，民初政治“不惟进步，甚且生退步之现象”^{[16] (P47)}，使渴求社会稳定、避免动乱成为各派共同呼声，许多人认为只要存在着将来建立民主政体的可能，眼前的假共和、真专制是可以忍受的。在此心理作用下，革命党人采取了以政治上的退让来换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行为，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表现各异，程度不同，目的有别，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却是背离民主共和观念与制度建设，导致中华民国的开局就倒向人治与专制。这样也为袁世凯走向复辟提供了契机。

三、帝制舆论左右社会

社会心理具有实用性和迎合性，因其实用性，历来统治阶级都利用它来满足眼前需要，赢得多数人的心理支持；因其迎合性，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见机行事的特点。辛亥革命固然是变更了政体，但本质上是“新瓶装旧酒”，人们的内心世界并没有随之更新，皇权思想、君主统治的地位依旧是至高无上。不仅袁世凯具有强烈的帝制思想，而且北洋将领、帮闲文人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帝制的钟爱之情，从袁政府后期的社会舆论可以明显看出，旗帜已倒向了帝制复辟一方。

袁世凯以北洋起家，逐渐培植了忠于他本人的北洋集团，自己实际上成为霸主。在袁氏封建帝王思想影响下，北洋将领也希望通过帝制达到封官进爵的目的。如同杨度所言：“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只不过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17] (P322)}北洋将领和袁世凯在心理上的互相迎合，使复辟之风愈演愈烈，筹安会成立后不久，许多将军、巡按使纷纷列名劝进电表示赞成变更国体，湖南将军汤乡铭最早发劝进电，“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18] (P344)}。北洋陆军总长王士珍、海军总长刘冠

雄及陆军中、少将领纷纷密呈袁世凯，请愿实行君主制，1915年11月，陈宦受命为四川都督，临行前就“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嗅袁之脚，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此去到死都不回来了。’”^{[19] (P120)}固然北洋将领中拥有实力的段祺瑞、冯国璋对袁世凯复辟表示反对，但他们二人所反对的是袁称帝，并不是帝制；在他们看来，一旦袁称帝，他们便永无出头之日，终生只能做袁家之狗，必然破坏他们未来的专制、独裁之野心。在袁世凯的权威和利诱下，即使段、冯存在异心，也只能是袖手旁观，并不敢站出来反对。冯国璋还发电辟谣袁冯分家，表示与袁“以私情言之，受恩深重，以公谊言之，为心悦诚服，”^{[18] (P346)}在集团利益、集团心理的互动作用下，北洋将领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达成了共识。与此同时，地方要员在切身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迎合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愿望，也都上拥戴书、劝进电赞成帝制。张作霖首先要求袁世凯“速定国体，以安大局”，并发誓：“帝制之后，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以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本部以平内乱！”^{[6] (P568)}阎锡山向袁密奏所谓“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宪政。”^{[20] (P181)}象阎锡山这样因惧怕北洋势力，唯有附袁才能保住和稳固自己的权位的地方要员并不少见，北洋将领和地方实力派的表现推动了复辟的进程。

由于舆论是社会导向，因此统治阶级总要借助于舆论力量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实行报业管制政策，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闭的报馆达71家，被传讯49家，被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21] (P134)}。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创办御用报刊，并通过各种方式收买了一些报刊为己利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在残酷镇压下，帝制过程中除几家外文报刊对帝制表示异议外，其余报刊在宣传导向上都被袁世凯牢牢控制，迫使他们倒向复辟或保持沉默。与此同时，君主优于共和的论调甚嚣尘上。1915年8月3日，袁之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实行君主

制，“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22] (P951)}。杨度则自告奋勇组织了一个帝制鼓吹机关——筹安会，打着学术自由的口号，炮制复辟理论，抛出《君政复国论》、《国情论》、《君宪救国论》等文章，发出“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的谬论。在此鼓吹之下，复辟之论暂时占据了舆论阵地，左右了社会动向。1915年，《申报》函访各省舆情，“反对帝制者，仅为湘、鄂、粤、桂四省”^[23]，如此舆论环境，最终使复辟闹剧登上历史舞台。

四、民主共和未入人心透视

回眸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的历程，近现代中国在探讨西方的理念过程中所呈现的大抵脉络，没有脱离梁任公所总结的路径：从器物层面而制度层面而文化层面。民主共和宪政思想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核心理念表现为对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所持的基本立场——控制国家权力。中国政治传统中支撑宪政民主的思想因子甚少，如何借鉴来自异域的民主共和理念与制度安排，这是近现代中国所要面临的时代课题^[24]。

辛亥革命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了封建帝制。但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下的人们并未能迅速领略革命成果，社会仍处于沉醉状态。旧有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文化传统还指挥着人们的行为，传统的政治文化心理依然统治着民初社会，民主共和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临时政府的地方基础仍是乡绅政权，在政治上绝大多数官员们仍然是运用封建机制进行操作，特权人治观念主宰着人们的头脑。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在观念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臣民意识而不是公民权利意识。封建土地所有制制约下的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具有现代精神的民主共和理念很难获取普遍的社会认同^[25]。考察民初民主共和观念以及制度建设，对西方来讲，不仅仅是少数思想家的呼吁和呐喊，也是一般公众的基本信仰和价值理想。在西方，民主共和观念与其整个思想传统，尤其是宗教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不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而且具有

价值合理性。这种价值合理性的取得,在于它是西方历史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自然演进并同社会的伦理规范、习俗和宗教信仰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因此,民主共和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一种“信念伦理”。“信念伦理”更多地是受历史人文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之相应的行为与其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主要是由根深蒂固的习俗和信仰等非理性因素所决定。民主共和观念在辛亥革命后在近现代中国的异化或变形,一方面能使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传播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背离。民主共和等观念与制度是西方社会历史长期演进的产物,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合。西方社会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追求虽然也其外在的目的和效用,但主要是一种价值理性行为。而在近代中国民主共和主要被作为救亡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实际上,近现代中国并非没有人把民主共和观念作为信念和理想执著地追求,但是当把他们把民主共和观念视为一种信念执著地追求时,却又无法跨越摆脱日益严重民族危机和追求国家独立富强,这一社会现实目标和主题。结果只能是,为追求社会现实目标而放弃民主共和理念,或者使民主共和从属于社会现实目标并为其服务。追求民主共和的价值理性行为与追求社会现实目标的工具理性行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条件下实难做到兼顾。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民主共和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追求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当社会变革过后,民主共和观念并没有在人民的心理留下深刻的痕迹。因为近代中国缺乏西方民主共和观念赖以成长、发育的气候和土壤^[26]。J.B.格里德曾精辟分析道:“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并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与革命之中,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

答案”^[27] (P377-378)。这一看法对民初民主共和观念与制度建设同样适用。

五、结语

以民初两次复辟为例,不仅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并未深入人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心理的体现的结果。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比较直接的反映形式,它能够客观地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变化的基本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民族文化心理的开化与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不是同步而行。由于社会存在巨大的惰力,传统的精神支柱、价值取向、文化心理并未能随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广泛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心理因素如求同斥异心理、狭隘平等心理、重情轻法心理、怕官拜官心理、重义轻利心理等或与民主共和的主张相反,或难以与民主共和的主张相容,它们都民主共和起着抵制作用^[28]。中国大众意识长期以来表现了对传统政治意识的依附性,缺乏自我指认自我建构的独特品格。在利益大体一元化、生产方式基本单一化、政治设想统一化和伦理认识传统化的历史发展中,大众意识总被传统政治意识同化为个性的“缺席”。^[29] (P137) 历史是过去的现在,而现实则是历史延续。两次复辟帝制的闹剧虽然成为一个笑谈,但诸如民主共和等现代性观念,尚未完全深入人心,历史经验的表明,民主共和观念如果不落实为制度建设,仅仅靠强人治,必然是“种瓜得豆”结果。

参考文献:

- [1] 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 [A].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 [2] 孟恩远等敦请袁世凯早登皇帝位电 [A].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等.护国运动(中华民国档案资料丛刊) [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 [3] 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一卷) [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 [4] 杨度.杨度集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5] 黄远生.黄远生遗著(第一卷) [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 [6] 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 [M].

- 北京：中华书局，
- [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8]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9] 《癸丑祸乱纪略》（卷下） [M].上海：有益斋，1913.
- [10] 申报 [N].1935-5-30.
- [11] 申报 [N].1935-10-5.
- [1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3] 章太炎.章太炎评论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8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4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9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7]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M].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 [18]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 [19]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 [20] 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组.阎锡山评传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1] 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 [22] 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二卷） [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 [23] 申报 [N].1915-10-21.
- [24] 刘志强.自由主义宪政思考与分析 [J].学术界,2007(6).
- [25] 程德文.从专制人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及其意义 [J].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3).
- [26] 马振超.近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认知与解读 [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0).
- [27] [美] J.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 [28] 汪秀枝.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失败的民族心理原因 [J].河南社会科学,2003(6).
- [29] 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法律现代性引出的一个问题 [A].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 [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肖承罡]